

目 录

我所知道的胡汉民被囚汤山的经过·····	卞稚珊 (1)
回忆抗战期间桂林日文日语	
训练班与鹿地亘·····	何坤巽 (29)
抗战时期暂编第二军艺术宣传队始	
末·····	李林园 (40)
抗战中期第七战区军粮补给情况·····	李洁之 (57)
第三十七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亲	
历记·····	陈祖荣 燕 茂 (66)
粤东起义中我对保安独立第一营和	
保安第十二团的策反经过·····	陈柏麟 (71)
解放前夕激战五经富·····	陈倚昌 (88)
解放战争期间的南京政府国防部新	
闻局 (政工局) 见闻点滴·····	李廷芳 (98)
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	
教育权运动·····	陈家文 黄穗生 (98)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中山大学学生运 动和民盟活动情况.....	曹 理 穆 清 (118)
悼念李伟烈烈士.....	李以助 (127)
廖鸣欧烈士的生平及其殉难经过.....	李洁之 (133)
古应芬和勤勤大学的创办及其演变.....	蔡桐坡 (140)
解放前广东图书馆事业发展概述.....	罗 屏 (148)
广东籍留美幼童简述.....	梅 嘉 (179)
香港旧事闻见杂录 (五)	陈 谦 (200)

我所知道的胡汉民被囚汤山的经过

卞维珊

一、胡汉民对国民党忠心耿耿

一九三一年，我在南京担任首都保安警察总队长兼南区域防指挥。主要任务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院、部、会机关的警卫及首都各城门的治安工作。因此，为要对国民党特权阶层人物的安全负责，就不能不了解他们的政治生活、社会关系、生活习惯，做到心中有数。当时在国民党内部，一般对特权阶层人物的印象是：认为胡汉民自从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反革命大联合，组成一个全党性的中枢，把胡汉民拉进五院院长行列（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担任立法院长以来的三年中，为国民党政府撑持门面，维护中枢，在政治上卖了不少气力，对蒋介石能够在军事上打败阎锡山、冯玉祥等之后，放手向江西红军进攻，起到一定作用。单从旧的政治生活、道德观念这一点来看，表面上胡汉民三年来是足不出都门的，确不象其他权贵那样每星期日都要到上海租界过那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谁都知道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两班沪宁铁路夜快车的头等

卧铺，都为这些达官贵人所垄断，一般老百姓是无法享受的。就连一些道貌岸然的老朽，如绰号刘佬佬的吴稚晖（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美髯公于胡子右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等职司监察的也不例外，每周都要避开群众耳目，跑到上海租界这个大观园去乐一乐。因为胡汉民有其与众不同的旧道德观念和生活作风，因而在特权阶层中，享有较高声望。蒋介石、胡汉民之间的分工合作，尽管是同流合污，需要相互依存，但也存在矛盾。由于各自争夺名利，因而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从合作到分裂的局面。

二、蒋介石陵园设宴软禁胡汉民的真相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深夜，同我住在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的吴礼苍（同盟会员，曾任刘伯承元帅在川军时的秘书，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秘书）公毕回家，张惶地告诉我：“老弟，出事了！”我问：“什么事？”吴答：“展堂（胡汉民号）先生被扣留了！”我说：“哪里会？”吴说：“真的，就是刚才的事。”又问：“哪个扣留的？”吴答：“除了老蒋（蒋介石）还有哪个敢哟！”再问：“为啥子？”吴答：“不知道。”当时我们都为这一突然事变感到震惊。因吴在东京留学时对胡较有好感，彼此相对唏嘘者久之，但总猜不透这两根所谓国民党的支柱为啥会闹到这样地步。由于这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已失败，军事上的噩耗不断传开，因而在政治上又增添了一层阴影，不能不使人担心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我又继续探问：“消息从哪儿来的？”吴悄悄对我说：“只能让我们两人知道，老蒋那股火发了，不知要株连多少人，就是老总

（指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都闷在葫芦里，现在中央（国民党）各要人都为这一事变提心吊胆，不知火石（祸事）还要落到哪个头上来！刚才，老总匆匆从陵园官邸回来，要我马上通知办公厅人员，对于胡院长因病休养的事，不准对外说，并叮咛我特别要告诫我们的人（指随朱从江西省政府调到办公厅的亲信，吴亦其中之一）不要乱说，不要乱走等语。”吴又说：“老总平时战时应对事变都很沉着，这回特别紧张，而且历来各院、部、会长官因病休养，根本不同办公厅打招呼，既要打招呼，又要不准谈，这中间明明有文章，我始悄悄去问随朱赴宴的黄副官，他才告诉我到陵园遇到的情况。”

“黄副官说：委员长今晚在陵园官邸宴客，有两桌人，还是象往常一样，到了八点钟，客人差不多都到了，我记得有：戴季陶、于右任、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朱家骅、叶楚傖、邵元冲、邵力子、陈布雷、陈果夫、张静江、张群、何应钦、吴铁城、谷正伦和朱培德等，都被一一引到官邸左边的餐厅里，济济一堂，谈笑风生。这时委员长还在楼上没有下来。侍卫长王世和跑来招呼我们所有侍从人员都到侍从室休息，并郑重宣布：等一会儿有什么事发生，不关你们的事。千万招呼同来的卫士、司机不要乱动等语。同时我们已经发觉各处警卫不同寻常，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猜不出要发生什么问题。我就借口送公文皮包给老总，溜进餐厅，把外面情况悄悄告诉他。同样有其他几个侍从也进去传递消息。这一下，弄得热热闹闹的餐厅顿时鸦雀无声。有的人惊惶失色，有的人闭目凝神，各想各的心事。隔了不久，胡院长最后到了，王世和赶忙亲到车前，把胡院长引到官邸右边的会客室，让胡一人留在室内，紧接着来了两个卫兵，守住门口。胡院长一见情况有异，脸色骤变，但很镇静，不言亦不坐下，一直在

室内背起手踱来踱去。当王世和引胡院长进入会客室的时候，另有几个侍卫队官兵，以两人监视一人的办法，强制随胡院长来的侍从副官、司机、卫士等到警卫室，要他们缴枪，他们不肯，初而言语冲突，继而摆出架势，准备动武，声言非有胡院长命令不行。这时王世和将胡院长安置好后，转来见此剑拔弩张的情况，吓得他急忙退入里面，他怕的是对方同他拚命，万一枪声一响，惊动主子，怪他草包，要受责备。王世和见硬的不行，才另派一个侍从出来，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宣称奉委员长命令，胡院长已被扣留。此言一出，更激起胡的侍从人员的义愤。大声质问‘胡院长犯了什么罪？’这位王世和的代言人根本不知胡院长犯了什么罪，糊里糊涂地说：‘这是他们（指胡蒋）两人在闹别扭，根本就不关你我的事，犯不着扯肉皮，只要交出枪，等他们把话说清楚，枪，还不是会交还你们’。停一停，他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请你们想一想，在这个地方要要枪，还行吗？’胡的卫士终于悻悻地把枪扔出来。”

“黄副官继续说：大约又隔半小时，委员长才从楼上下来，态度严肃，迳入餐厅，随即招呼大家入座。接着餐厅里只听委员长一人好似训话一样，中间有些话，语音特别大。如‘展堂近来精神失常，已有病态，我要他休息一下。我考虑过，不这样办不行！这几年来，我把中枢重任托付于他，不但没有减轻我的麻烦，反而一再反对我的主张，他忘了他这条命，不是我救他，那还有今天……’。只听委员长讲了好一阵，全场静悄悄的。最后戴院长才说了一句，‘让展堂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宴会就此不欢而散。”

至于留在会客室的胡汉民那晚的情况，后来在胡恢复自由离开南京前我问过他，他说：“那晚从会客室设置卫兵起，到餐厅

宴会客散止，等到外面汽车开动响声都静了，还不见蒋介石进来，我才向卫兵要笔墨，写了一张条子交卫兵送上去，我一定要同蒋介石面谈。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蒋介石才下来，走进会客室，彼此心中有数，他先开口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被激起了忿怒，立即狠狠教训了他一顿。我问他：‘你想要干什么？总理（孙中山）在世时，我是怎样替你说话，直到近几年，我又怎样苦心孤诣把中央局面稳定下来。你以为冯、阎就甘心失败了吗（指一九三〇年结束的蒋、冯、阎中原大混战，冯、阎佯称下野出洋，实际是企图保存实力，退守西北）？张汉卿（张学良）真的拥护你吗（指中原大混战中，蒋派吴铁城、张群等到东北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平津地盘为条件，拉拢张学良派兵入关，冯阎受威胁而失败）？江西军事失利是小事吗（指蒋低估红军力量，认为第一次‘围剿’失败，仅仅是指挥不得其人）？你以为军事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那么，江西军事就不应该失败！在政治上共产党抓着我们一些弱点攻击，影响越来越大，你每次在纪念周会上（每星期一上午各机关都要集会纪念孙中山）宣读总理遗嘱，都要大讲特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提倡新生活，改变社会风气，以抵制共产党的宣传，我不是说做得不对，而是说做得好。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能够服人吗？今天不管那一个，要关要杀，全凭一个人的高兴，究竟国家还有什么法纪，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这样做，将会带来怎样后果，你想到没有？’可是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最后想出了一句无赖的话来搪塞：‘讲，我讲不赢你，总之你对不住我。’紧接着他就硬逼着我，气势汹汹地问：‘究竟愿不愿起草约法？’这是违背总理建国大纲的，遭到我的严词拒绝后，他就拂袖而去。当晚把我送到汤山。”

以上是当年胡汉民答我所问的情况，我没有进一步追问。后来

为了进一步弄清蒋、胡之间矛盾激化的关键所在，曾请教过同胡一道参加辛亥广州起义的老战友但懋辛先生。据他所了解的情况是：蒋介石之所以不顾一切扣留胡汉民，是因为民国十九年打败冯阎之后，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目的是商洽一个约法，然后根据约法于次年召开国民议会制订宪法。胡那时看出了蒋的武力专横，别有用心，未予正面驳斥。只说“可以照建国大纲的训政时期办事就行了，不必再拟约法，俟机会成熟，即召集国民会议创订宪法”。因为那时约法应由立法院起草，不通过国民会议，在宪法未施行前，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相等。正如辛亥革命时，南京成立临时政府，由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制订约法一样。但是，当时南京已经是正式政府，就不可再用约法，只是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永久性的宪法就行了，所以胡不干。胡事前还向人表示过：军人的政治知识浅薄，武断专横，动辄要刀，要效美国宪法精神，现役军人不能参加总统竞选。蒋闻之大不以为然，认为胡在立法上和选举上都是他的对头。但是胡在那次会上并没有正式提出他的主张，只是强调没有草拟约法的必要，而蒋则非草拟不可。由于两人都坚持己见，那次会议没有把这个问题决定下来。以后蒋约胡单独谈（即陵园设宴扣胡那一晚），一定要他在立法院草拟约法，胡一再说明理由拒绝。蒋沉不着气了，就威胁胡一定要写。并说：“胡先生如不答应，那就会对你不起。”这就把胡惹冒火了，他拍着桌子说：“随便你，杀头，我胡汉民也不怕。”蒋就一冲上楼，立命卫士把胡扣留，押到汤山与外地隔绝起来。

上述情况，在但懋辛先生生前，我曾专函征求意见，据复：“民十七，胡自俄国归，经上海去南京时，我因事不能去会他，熊某（指熊克武）要去会，我请熊转达，劝胡不要去助纣为虐。胡答云：不能把国民党看成是蒋介石的。熊以此告知我，我说书

生之见，不知流氓之毒，必无好下场。”

从以上胡汉民对我所说和但懋辛先生的回答看，蒋、胡之争，关键在于制不制订约法，而制订约法之重心又在于要不要现役军人竞选总统。蒋既有心，胡亦并非无意。蒋怒胡之不作驯服工具，胡则愤蒋之日益跋扈专横。胡欲以法制蒋，而唯我独尊的蒋介石，则视胡为眼中钉。胡之被扣，渊源在此。胡被扣后，由蒋一手包办草拟的约法就不再提现役军人竞选的问题，从而为蒋于一九四八年窃据总统宝座，扫清了道路。

三、假惺惺，蒋介石下令“保护”胡汉民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电话约我立刻到厅里谈话。到达时，警厅的核心人物楼文钊（主任秘书）、李进德（督察处长）已先在座。吴即出示蒋介石手令：“胡院长应即移住双龙巷孔宅（孔祥熙部长公馆）。着由首都警察厅派保安警察严密保护，具体部署和行动同王世和密切联系。中正，三月七日。”

我看了手令后，给我思想上第一个反应是胡汉民还在，这足以证明了近来外面一般人所猜测的胡已死或出国都非事实；第二个反应是立法院历来就是由保安警察警卫，为什么这回蒋介石要亲自下手令，不要胡汉民回立法院或胡公馆，而指定要住孔宅？第三个反应是保护上层人物，布置警卫，保安队平时都是独立行动，为什么这回要王世和插手？而所谓“严密”保护，使我回忆起吴礼苍告诉我的消息，结合这些天来西南激烈反对的情况，未必不是蒋介石迫于形势，对胡汉民杀既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只得把人交给我，名为保护，葫芦里又是另一包药。就我的职责来说，不能不执行命令。但从我的真实感情来说，则又是有抵触

的（我与胡的关系，另文补叙）。

正由于我对蒋介石、胡汉民之间抱有不同的观感，因而我一看到蒋介石的手令，就联想起蒋介石把居正（号觉生，原司法院院长）禁锢在南京周必由巷时^①所给我的手令，不也是明明白白写的“保护”字样吗？蒋介石一贯使用书面一套，实际一套的手法，我不能不把这手令的真实意图弄清楚。我就直截了当问吴思豫：“委座（蒋介石）还有其他交代没有？”吴亦开门见山地回答：“胡汉民反对委员长，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不住汤山移住城内，不用侍卫队而用保安警察，名为保护，说穿了就是监视。但又要在有我们的人监视之下，允许他在南京到汤山这个范围内活动，这都是为了对付西南和外面一些人的责难，所以对外要说成是保护。委座还交代除了戴院长（传贤）、邵副院长（元冲）、吴委员（稚晖）三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非有委座条子，一律不准与胡会晤。明天傍晚，即由王世和把人送到双龙巷，此后就是保安队的责任了。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要做到连胡本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才对。”

根据蒋介石意图，经过大家仔细研究，吴思豫最后决定，由我负责选派一个中队布置双龙巷孔祥熙公馆警卫；由楼文钊负责会同该管区警察局于明午将孔宅及其周围有关楼房让出备用；由李进德负责与王世和联系，商定交接时间和手续。会毕，我即往双龙巷现场视察拟订布置如下：以一个班担任门警，形式上与一般要人住宅的警卫同。孔宅西面、北面、东北角楼房，各派潜伏哨一组，暗中监视孔宅内部。加强双龙巷西口通黄泥岗、东口通丹凤街的交通岗，注意来往行人和车辆。将孔宅原有电话拆除。中队部位置于黄泥岗工商部兼任该部警卫，原派警卫归还建制。我即交代第一大队长胡绍韩（吴思豫的亲信），选派一个浙江

籍、黄埔军校出身的中队长担任，目的是为了预防发生意外事故，可以减轻我的责任。

午后，我又召开担负这一任务的有关队长会议，并向全体士兵讲话，主要是强调这次委员长亲自交代的任务，既不同于一般保护，又不同于一般监视，既要达到委员长的意图，又要做到胡院长无话可说。要求对外保密，严守纪律，遇事上报，不得擅自行动。上述我这些安排的用意，与其说是防胡，毋宁说是防蒋。一方面防的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另方面防的是这些警察老爷们狐假虎威，嚣张成性，不能不用蒋介石这块令牌来将一将军。

我将布置情况向吴恩豫回报，同时楼文钊、李进德也交流了联系情况。诸事齐备，只是胡汉民提出要带他的女儿胡木兰和一女佣随伴。请示蒋介石得到同意。到下午六时许，王世和将胡汉民从汤山押来，由胡木兰扶持下车，踉踉跄跄地到孔宅楼上沙发上一躺。我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他把眼一瞪，头一摆，大有天下乌鸦都是一般黑之感。此后，我隔三几天前去巡视一次。胡总是心事重重，抑郁寡言，我也只得对木兰三言两语即去。

四、西南援胡反蒋，蒋介石的对策

胡汉民坚决拒绝蒋介石的非法要求，蒋介石恼羞成怒，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当时作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胡汉民与外界隔绝，很快就激起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如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统一政府的胡汉民派、孙科的太子派、张继的西山会议派等首脑人物都明白蒋介石权迷心窍是不择手段的。为了避免株连，纷纷潜去上海商谋对策。而在广州，与南京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的政治分会的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和两广实力派李宗

仁、黄绍竑、陈济棠、白崇禧、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等对于他们作为政治支柱的胡汉民无端被扣，更是激烈反对。这时在香港的前北平扩大会议主席汪精卫，不甘心他在不久前同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失败，又利用西南反蒋机会，企图东山再起。于是年五月间与西南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西南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唱对台戏，借以迫使蒋介石释放胡汉民。

西南这一行动，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计划，使他扣留胡汉民的阴谋，遭到中途挫折。在此以前，正当西南酝酿军事反蒋之际，蒋介石也曾考虑到这将不利于共同制订约法，更不利于团结反共。因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除了原派戴传贤、邵元冲、吴稚晖三人对胡汉民进行劝说外，旋又增派陈布雷、张静江、于右任、叶楚傖、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等前后共十一人对胡汉民进一步施加压力，要他放弃反对制订约法的主张，却始终遭到胡汉民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趁胡失去活动能力的机会，积极准备召开别有用心之心的国民会议，以图得到在胡汉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为了对这一会议增强压力，他又拼凑了二十万大军向江西红军进行所谓第二次“围剿”，并下令前线必须于五月五日前，即国民会议开幕前，攻下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瑞金等地，消灭红军，以显示他的威力，借以消除对他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怀疑和动摇。结果，遭到比第一次“围剿”更加惨重的失败。尽管蒋介石因西南造反而采取的两个对策都宣告破产。但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并不因此作罢。

五、所谓国民会议，蒋介石玩弄民主

蒋介石并不因胡汉民作梗，西南分裂，江西军事一再失败，而放松对党、政、军权的独揽。一方面，他认为冯阎业已下台，张学良又被拉拢过来，这几股当时最大的实力派，都在他的纵横捭阖权术下屈服，正宜抓紧时机，从政治上为将来的总统梦找根据。所以必须召开国民会议。而另一方面，他明白，如果不是张学良投顺过来，他早被冯阎打垮。现在冯阎名虽下台，但是遗留下来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保持相当强大的实力。而张学良进驻平、津，实际是取冯阎而代之。由于东北军与西北军早有多年的历史渊源，两军上层人物之间，也各有各的深厚关系，因此，蒋介石这时既怕张学良独自吞并冯阎部队，壮大了别人，孤立了自己，但又不能不依靠张学良。为此，蒋介石采取了分化、利用、限制的毒计来对付这些杂牌部队，企图借刀杀人，消灭非嫡系部队。这就是蒋介石要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急急忙忙地于南京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会议，标榜民主政治的内幕。

国民会议召开时，我被派充国民会议的警卫官。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作为蒋介石最重要的上宾，就是张学良，他是蒋介石御用的国民会议最有力的配角。蒋介石心目中，只要把少帅(张学良)敷衍过去，就万事大吉。因此，他贯注全神，抓住这个关键，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保证会议安全，严防捣乱破坏。对胡汉民加强看守，既不让一点消息传给胡汉民，也不让胡汉民有一句话透露到外面。为此，特命我抽调两个大队和机枪、手枪、骑巡、车巡各一队，配合宪兵担任会场内外警卫。会场在中央大学，是专为召开

这次会议而设计建筑的。主席台下面筑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会议期间，要布置一个中队在地下室。担任警卫的官兵都要经过严格选择，每人要具三人连环保结。主席台顶设有瞭望台，有钢筋水泥掩蔽体，东西南北各置一挺重机枪。场内各要道有全副武装的岗警，各进口处有门警，转弯抹角有暗探。场外附近街道有骑巡队、车巡队分段巡逻。主席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休息室完全由侍卫队警卫，除持有特许证的人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会场。此外，会场出入证分四种颜色。红色的可以上主席台，蓝色的可以进会场，黄色的只能到旁听席，白色的是工作人员证。警卫人员的行动都有一定限制。警卫处长（吴思豫兼）可以上主席台、进出休息室。警卫官也只有工作需要才能出入会场，其他服务人员只准在指定范围内活动。就这样，几乎是用人盯人的办法，保证了会议的安全。

其次，防止夜长梦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保证议案的顺利通过。蒋介石用尽心机，宣扬这次是最“民主”的“会议”。他这个所谓“民主”，实质上就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一手包办。所谓“会议”，就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他充分估计到除了“少帅”一伙人之外，不会有人持异议的。因此，他用全副精神对付“少帅”。针对“少帅”有吗啡癖、舞癖，就精心安排一套疲劳轰炸的日程。使“少帅”一伙人夜以继日地奔忙于“三会”（开会、宴会、舞会）之中。

再次，最突出的是办好招待。特派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任总招待。为了争取“少帅”一伙人的欢心，他们需要大批的舞女、歌妓和香槟、白兰地、金山橙、巧克力、雪茄烟、人头土（印度鸦片烟）以及山珍海味、点心罐头等等，应有尽有，都是用火车整车皮整车皮从上海运来。招待对象，主要是张学良一方，从上到

下分别指定专人负责。如张学良由吴铁城、张群招待，于凤至（张学良妻）由宋美龄、宋霭龄分别陪伴。高级幕僚如王树翰、莫德惠、刘尚清、刘哲、沈鸿烈、鲍文樾等则由各院、部、会每日轮流设宴招待。宴会后，各有舞会、戏剧、杂技、清唱、电影、台球以至烟赌等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各投所好，各尽其兴，不到鸡啼，不会收场。娱乐场分等级，高级的设在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吴国桢等人的豪华别墅内；一般的则设在励志社、中央饭店、安乐酒家等处；至于中级以下的随员、副官、卫士、司机等都安排有相应的人员陪吃陪玩，不使一人向隅。这一幕独出心裁的“盛会”闹得满城乌烟瘴气，使得张学良同他的幕僚之间，也难得机会碰头。至于下级随从更是有吃有玩有收入。如宋美龄第一次私人欢宴于凤至，赏给于的随从人员就是三千银元。还有奉命陪赌的人员，只准输，不准赢，输掉的准到总务处作特别费报销。蒋介石就是采用“金钱万能”的办法，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上述布置下，使得张学良这一方，对会议的进行毫无准备，也无暇准备。而蒋介石那一方就大大不然，每晚深夜，蒋介石都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亲信，亲自主持秘密会议，有计划、有准备地安排次日议程。提什么案，哪些人发言，如何监视表决，均作了布置。并有意识地安排座位彼此交叉，以便于控制。就这样，张学良连文件都来不及看，更谈不上提不同的意见，就糊里糊涂，随声附和，赞成！赞成！通过！通过！蒋介石毫无阻碍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是，他的日子并不因此而好过。他忧心忡忡的还是不甘心于江西军事的一再失败，使他坐卧不安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发展壮大。因此，在国民会议闭幕后，他又重新调集更多的运输队，妄图火中取栗。突然，“九·一八”事变

爆发，震动全国，形势逼人，终于打乱他反共反人民的如意算盘。

六、西南内部矛盾重重、援胡反蒋同床异梦

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以后，蒋介石并不因此而轻视扣留胡汉民的作用。特别是西南正在造反，控制胡，就可以发挥控制西南的作用。当他去江西“御驾亲征”的前夕，还一再询问胡汉民的生活情况，并嘱咐我不要使胡受到刺激。胡的一言一行都要向侍从室汇报。只要抓住胡不放，不愁西南不买账，等到江西军事胜利后，无论采取软的或硬的一套，西南问题不难解决。这可以从以后红军向西北长征后，西南海空军离粤，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投蒋，迫使统治广东多年的陈济棠垮台，蒋介石仅仅花了几个钱，甩出几个官，又重新统治西南，得到证明。

当时被困在双龙巷孔公馆的胡汉民，一方面愤恨蒋介石手段毒辣；另一方面担心蒋介石随时可以下毒手，因而终日徘徊楼上，足不下楼。本来蒋介石允许他可以在南京至汤山一段路上自由逛游。但他明知这是蒋介石耍的花招，故从未要求一次出游，把唯一能够恢复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南方面，可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消息依然渺茫。精神上的折磨，内心的痛苦，加剧了他身体的日益衰弱。

西南国民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的激化，是以原来半独立状态的国民党西南政治分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这一局势，在政治上是以胡汉民派为核心，在军事上是以陈济棠为柱石。蒋介石对此，尽管大不满意，但他不甘心于江西军事的一再受挫，无暇兼顾西南，致使陈济棠坐大、独霸一方。当胡汉民被扣，陈在政治上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转而利用汪精卫，以资号

召。汪历来就是随风倒的投机政客，领袖欲大，不甘心于“扩大会议”的失败。现在将胡闹翻，正是捞取政治资本、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他利用西南国民政府主席这块招牌，表面上是援胡反蒋，实际上恰恰相反，一切是为自己。他同胡汉民的政治主张，从来就是各有一套的。因而他援胡是假，为己是真。而对蒋介石则是相互利用。蒋需要利用汪作他的政治傀儡，汪需要利用蒋作他的军事支持。因而与其说汪要反蒋，毋宁说汪的反蒋是为了投蒋。正如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后，“七·一五”以汪精卫为首的集团举行的所谓“分共会议”，公开背叛革命，投靠蒋介石一样。

至于陈济棠援胡反蒋的态度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援胡是真，反蒋亦不假。两者都是他盘据西南不可缺少的条件。结果，他援胡援不了，反蒋也反不成。症结所在，是他虽有援胡的愿望，但因力量不足，终难实现。而汪精卫则是别有用心，心不在胡。轰动一时的四面援胡反蒋活动，并没有迫使蒋介石改变原意，恢复胡汉民的自由。而在广州的国民党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等倒是十分关心胡汉民的安危，没有袖手旁观临危不救。他们深知汪陈两人都不可靠，才派专人到沪，委托驻沪的曾经同胡一道参加过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的老战友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喻培棣等，就近设法援救胡，终于找到援胡反蒋的另一途径。

七、熊克武、但懋辛积极策划营救胡汉民

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旬，喻培棣由上海专程到南京三道高井我的寓所访我，照例住在我家里。他恳切地对我说：“我奉锦公（熊克武号锦帆）和老二哥（一般对但懋辛尊称）之命来营救胡